



作为举世公认的理论大家和文章大家，毛泽东是怎样写文章的呢？总体来看，毛泽东喜欢写生动活泼的文章，讨厌枯燥乏味的“八股文”。他的精彩文章多种多样，写法也神采各异，不能以一个标准来衡量。仅就毛泽东如何写理论文章而言，以下几个方面特别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分析中国的实际问题”——以问题为切入点

因矛盾而思考，由问题而切入。毛泽东写文章从来不是为写而写，一定是以问题为切入点，从问题意识开始下笔。以收入《毛泽东选集》开篇之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为例，开头语即提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他沿着这个问题对当时中国社会各个阶级的思想生活状况以及他们的实际举动进行生动而非呆板的分析，在文章结尾处给出明确的结论：哪些阶级是“我们的敌人”，哪些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哪些人“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哪部分人“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并特别强调，“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毛泽东的其他文章也大都围绕问题展开的。

问题意识不是凭空产生的，“问题”是从实际中来的，从调查研究中得到的。这就是毛泽东为什么要不断强调“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的道理。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没有调查研究写出的文章就是“闭着眼睛在那里瞎说”。他认为瞎说“是共产党员的耻辱”，因此他提出“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并反复提醒人们，写文章前如果“不到工人、农民、社会中去调查，不到群众中去调查，不在斗争中逐步深入调查研究”，就“不可能写出来”。

提出问题后，还要学会用科学的方法来分析和解决问题。毛泽东

特别强调，大家在写文章或发表演说的时候，要“学会应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去观察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他赞赏这样的理论家：“能够真正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质，真正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并且应用了它去深刻地、科学地分析中国的实际问题，找出它的发展规律，这样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理论家”。

“一定要有明确的观点”——不能满足于现象罗列

既注重运用鲜活材料，又讲究观点鲜明。毛泽东多次强调，一篇文章必须讲出一定的道理、有鲜明的观点，反对材料或现象罗列。他指出，既然问题提出来了，“你总得赞成一方面，反对另一方面”；如果写文章或发言只提出一大堆材料，不提出自己的观点，不说明赞成什么反对什么，“这种方法更坏”。“对事物有分析”的文章才“有说服力”，“要学会用材料说明自己的观点。必须要有材料，但是一定要有明确的观点去统率这些材料”。

一篇文章要做到观点鲜明，就必须坚持真理。毛泽东认为，写文章或做演说，所阐述的问题，只要是反映科学的、真理的内容，就“决不怕人家驳”。他提出：“共产党不靠吓人吃饭，而是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吃饭，靠实事求是吃饭，靠科学吃饭。”正因为共产党人坚持的是真理，所以

要敢于亮出自己的鲜明观点。毛泽东强调：“我们共产党人从来认为隐瞒自己的观点是可耻的。我们党所办的报纸，我们党所进行的一切宣传工作，都应当是生动的，鲜明的，尖锐的，毫不吞吞吐吐。这是我们革命无产阶级应有的战斗风格。”这里反映的就是毛泽东坚持真理的思想品格，也是他写文章的一贯风格。

观点鲜明的文章，一般都是精炼且言之有物的。毛泽东认为，文章应该“写得短些，写得精粹些”，“最不应该、最要反对的是言之无物的文章”，“应当禁绝一切空话”。他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列举的“党八股的第一条罪状”就是“空话连篇，言之无物”，并批评道，“我们有些同志欢喜写长文章，但是没有什么内容，真是‘懒婆娘的裹脚，又长又臭’。”他断定写这样文章的人，“只有一种解释，就是下决心不要群众看”。他甚至提出，“主要的和首先的任务，是把那些又长又臭的懒婆娘的裹脚，赶快扔到垃圾桶里去。”毛泽东认为，那种没有明确观点、只会简单列举材料的文章的写法，“实在是一种最低级、最幼稚、最庸俗的方法”。

“要有比较恰当的表达方式”——必须抛弃“党八股”

一篇文章在提出问题并亮明观点后，“还要有比较恰当的表达方式告诉别人”。这是毛泽东写文章特别看重

的。他认为，写文章和讲话一样，一定要看对象；如果不看对象，写出来的都是“党八股”式的文章，就会“害人不少”。毛泽东比喻说，射箭要看靶子，弹琴要看听众，写文章做演说更要看读者、看听众，“乱讲一顿，是万万不行的”。

要养成人民群众喜欢的生动活泼、新鲜有力的文风。毛泽东历来强调，文章所用的语言要丰富，文字要有味，道，“如果一篇文章，一个演说，颠来倒去，总是那几个名词，一套‘学生腔’，没有一点生动活泼的语言，这岂不是语言无味，面目可憎，像个瘪三吗？”人民群众“不欢迎他们枯燥无味的宣传，我们也不需要这样蹩脚的不用中的宣传家”。毛泽东主张，要想做到语言上生动活泼、新鲜有力，就必须向三个方面学习：第一，“要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人民的语汇是很丰富的，生动活泼的，表现实际生活的”；第二，“要从外国语言中吸收我们所需要的成分”，但不能变成“洋腔洋调，中国人写文章没有中国味道”，要有“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第三，“还要学习古人语言中有生命的东西”。写文章或者做演说，如果具备了这三个方面的语言，就自然体现了“生动活泼新鲜有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风”。这样的文风，体现了共产党人的风格，也有利于党和人民的事业。

文章最终要“交由人民群众去考验”。毛泽东认为，写文章是要吸引人去看的，如果文章吸引不了人看，这样的文章是发挥不了实际作用的。吸

引人的文章，除了前面提到的有问题意识、有鲜明观点、有生动活泼的语言等因素外，毛泽东还强调了几点：一是文章标题要“吸引人看”，特别是理论文章和评述类的文章，“标题要吸引人看，这很重要”。但吸引人并不是哗众取宠，也不是空洞无物，而是要有实际内容，因此“标题必须有内容”。二是文章写完后要经得起反复审看，不能匆匆忙忙“拿出去害人”。写文章“是专为影响人的”，写好之后不能“马马虎虎地发表出去”，而要“多看几遍，像洗脸之后再照照镜子一样”，“重要的文章不妨看它十多遍，认真地加以删改，然后发表”。三是写出的文章要经得起群众“考验”，一篇文章形成观点的过程，就是“从群众中来”的过程；而把自己的观点和思想传达给别人的过程，就是“到群众中去”的过程，“人脑制成的这种完成品，究竟合用不合用，正确不正确，还得交由人民群众去考验。如果我们的同志不懂得这一点，那就一定会到

处碰钉子”。因此，只有那些群众看得懂的、喜闻乐见的文章，才经得住“考验”。毛泽东的众多精彩文章特别是理论文章不拘一格的写法，恰恰说明一篇好文章并不是学问家的玩味品，也不是理论家纯个人的思想产品。写出的文章要符合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方向，文章所反映的思想总得回到实践中去、回到群众中去，被群众认知和掌握，从而解决实际问题，特别是解决群众在思想和生活中遇到的各种难题。

总之，毛泽东说过：“文章和文件都应当具有这样三种性质：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从一定意义上讲，“准确性”，针对的就是要能够准确抓住所提出和想解决的问题，把反映中国实际和人民群众愿望的问题提炼出来；“鲜明性”，针对的就是要有鲜明的观点，赞成什么、反对什么，在概念、判断和推理上逻辑要清晰，态度要鲜明；“生动性”，针对的就是要有生动活泼的语言，要有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能够吸引人去看。毛泽东所写的文章，大体都是建立在这“三性”基础上的，使用的是“生动活泼切实有力”的语言和逻辑，所以他的文章看起来带劲，正如他自己所比喻的“像一个健康人”；而毛泽东反对的“党八股”类的文章，正如他所比喻的“瘦得难看，不像一个健康的人”。毛泽东作为理论大家、文章大家，真可谓文如其人！

（作者系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对外合作交流局局长、研究员）

老一辈革命家是怎样写文章的呢？学习时报专栏“老一辈革命家怎样写文章”，分别介绍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怎样写文章。

——编后

老一辈革命家怎样写文章

《诗经》中的春节

李媛媛

编者按

中国古代历史上的春节拥有诸多内涵丰富、形式多样的民俗礼仪。学习时报专栏“古代经典中的春节”，刊发一组文章，介绍古代经典中是如何记载春节的。文章分别为《〈诗经〉中的春节》《〈礼记〉中的春节》《唐诗中的春节》《宋词中的春节》《散曲中的春节》《明清小说中的春节》。

古人以一季耕种与收获为“年”。《说文解字》对于“年”的解释是：“年，谷孰也。”禾谷成熟之时，意味着农事告终，举行庆典，庆贺丰收，慰藉一年的辛劳，这是新年的缘起。《诗经》产生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虽然那时还没有“春节”这个词语，但已呈现了此后近三千年中国传统春节年俗的雏形，其中诸多场景和习俗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记忆。《诗经》对于新年的吟哦咏诵，蕴含着深刻的文明基因，滋养了

中国人的文化精神。

古老质淳的年俗

作为上古社会的百科全书，《诗经》记载了大量人情风俗、典章制度、历史事件，其中对于年俗的描写主要在《邶风·七月》之中。初冬伊始，人们就开始筹备新年。当时的年俗主要有：

准备新衣。《邶风·七月》中的第一章即为“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毛传》的解释是“九月霜始降，妇功成，可以授冬衣也”。这里的“授衣”是一种习俗和制度，在寒冬临近时，为劳作者发放冬衣。“无衣无褐，何以卒岁？”准备新衣，是新年必备的习俗，而只有按时节劳作，过年时才能有新衣可穿。

扫尘忙年。迎接新年的一项重要工作，便是对房屋进行清扫和修缮，《邶风·七月》中记载“穹窒熏鼠，塞向墁户。嗟我妇子，曰为改岁，入此室处”。将屋中的每一个角落和缝隙清理干净，用烟熏除藏于墙洞中的老鼠，同时封好北窗、用湿泥土糊住门缝，以免寒风侵入。扫除完毕，便可携一家男女老少，进入洁净的房屋，辞旧迎新了。

酿酒祈福。新年不可无酒。“八月剥枣，十月获稻。为此春酒，以介眉寿。”经历了一年繁忙而充实的辛劳之后，族人聚在一起，用丰收的稻谷酿成美酒庆贺丰年，为来年祈福，强烈的仪式感中满溢着迎接新岁的欣悦之情。

聚族蜡祭。祭祀是迎接新年的必备工作。“腊酒新醖，曰杀羔羊。跻

彼公堂，称彼兕觥，万寿无疆。”这句诗反映的是岁末“蜡祭”（又称“腊祭”）的年俗，即以禽兽祭祀农神。新旧交替之时，农人们宰杀备酒，祭祀农神与祖先，庆典之后欢聚一堂，举杯共祝族中长者长寿安康绵绵无期。

这些古老而质淳的年俗中蕴藏着中国人的人生观、时间观、价值观。所谓人情不远，虽然《诗经》距今有三千年的历史跨度，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其中纯真质朴的生命状态。

真诚积极、和乐欢快的人生态度

年终岁末，人往往会产生光阴易逝之感。《唐风·蟋蟀》中就发出“蟋蟀在堂，岁聿其莫”的感叹。天寒之时，蟋蟀进了堂屋。人看到此情景，不禁感慨一年时光匆匆。“今我不乐，日月其除。”新旧交替、除旧迎新之际，最易触发对于人对于时间和人生的哲学思考。这首诗在肯定人的正常享乐之正当性的同时，又警示人们“无已大康，职思其居。好乐无荒，良士瞿瞿。”行乐不可过度，君子好乐无荒，依礼节之，张弛有度，方可谋求长远，这是一种积极向上的人生取向。

无论冬夏，我们智慧的、纯朴的先祖们昼夜辛劳，除了农业生产，还要养蚕、织麻、打猎、盖房、造酒、祭神、祝福。但即便如此辛劳，在《诗经》中始终洋溢着一种乐观向上、踏实勤勉的精神状态，始终充满了对于自然馈赠的感恩、对富足生活

的期盼，这种坚韧、知足、感恩的生命态度是中华文明绵延至今的内在精神依托。

顺应天时、周而复始的时间观念

《尚书·虞书·尧典》记载：“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帝尧命令羲氏、和氏，严谨地遵循天数，推算日月星辰运行的规律，制定出历法，把天时节令告诉人们。上古时代，中国人对于“年”的认知是与农作物的生长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春播、夏种、秋收、冬藏，四季更替、星河流转，终而复始，生命律动呈现了自然的节奏。《诗经》中所体现的时间观并非线性发展，而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循环往复，“始”与“终”是交叠重合的。“九月筑场圃，十月纳禾稼”的收获之后又开始为下一年的播种做准备，以便春回大地时，可以顺利地“其始播百谷”。所有这些活动都紧贴时序，体现出古人对天地法则的敬顺，服从自然之律、顺应阴阳之变。新年是在旧岁紧张劳作之后短暂的休养生息，是为了即将到来的忙碌积累能量。

敬畏天命、慎终追远的文化心理

在“改岁”之前，周人往往先举行一系列的祭祀仪式，在这些仪式完成之后，才开始庆祝新年。“国之

事，在祀与戎。”祭祀在先民们的生活中有重要地位，主要分为祭天和祭祖两种。远古时代，先民对自然界抱着非常敬畏的心态。他们通过祭祀来达到与天、与祖先沟通的目的，希望得到庇佑。《周颂·丰年》中描述了丰收之年的壮观场景：“丰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万亿及秬。”农人们收获了数不清的谷物，堆满了高大的粮仓。“为酒为醴，烝畀祖妣。”此时，周人以粮食酿造的美酒来敬奉上天和祖先，表达感激之情、报答庇护之恩。“以洽百礼，降福孔皆。”因为丰收，祭品丰盛，礼仪很得当，希望能够继续得到庇佑、赐福。祭祀对于人们生活的影响无处不在，它寄托了对于天地和祖先恩泽的感怀，以及对于未来继续得到赐福的美好祈愿。

《诗经》是中华文明精神的源头，记录了中华民族最初经历的心灵历程。虽然其中所记载的新年仅仅是此后春节习俗的萌芽，但它所蕴含的情感、思想和精神，早已融入我们的血液，成为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潜意识。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文史教研部教授）

古代经典中的春节